

政治·外交

新时期亚太合作之路：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周冰鸿

摘要：从亚太合作的发展历程看，亚太合作存在以下不足：APEC 缺乏实质性进展；RCEP 和 CPTPP 路径部分重叠；少数国家抱团；东盟地区论坛被架空。这些不足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亚太主导权的争夺。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合作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大受欢迎，是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东盟“中心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根据熵增理论，开放的亚太共同体有利于把“蛋糕”做大。越南不太可能替代中国大陆的产业优势。基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美国难以与中国彻底“脱钩”。展望未来，RCEP 可能在贸易增长、人民币国际化、金融营商环境、全产业链竞争等方面，为中国带来利益与风险。未来 RCEP 如果能吸引印度加入，并制定更高阶的规则，会在与 CPTPP 的角逐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RCEP；APEC；中国—东盟合作；亚太共同体；一带一路

收稿日期：2022-08-02

作者简介：周冰鸿（1987—），外交学院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流通：全球化的中国视角”（编号：3162022ZYQB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亚太地区对中国至关重要。第一，中国外交一直强调“周边是首要”。亚太区域聚集了中国所有的海上邻国，以及多数陆地邻国。第二，大海的空间比陆地广阔。自 15 世纪起，相继崛起的帝国都是便于开展海上贸易的国家。中国的所有出海口都在亚太。第三，亚太地区位于中国版世界地图的中央。世界地图虽是一张纸，却是世界框架的表达。亚太区域位于中国人视野的中心，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尤为重要。第四，亚太地区强国林立，除了目前处于竞争关系的中国和美国，还有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俄罗斯等。人们很容易把亚太地区理解为大国竞争没有硝烟的战场。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缺乏建设性的视角。

半个世纪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促使邓小平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

两大主题”的论断。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但是，近年来反全球化^①变本加厉，中国政府认识到国际循环的动力在减弱，于是，把战略重心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双循环”平衡，同时更倚重国内循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②拜登上台后，中美竞争态势加剧。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美国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的严厉制裁，并通过俄乌冲突向中国传导战略压力。这些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正在经历巨大波动，面临不确定的发展趋势。

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参与亚太合作的目的依然是把握战略机遇期，但利用机遇期的方式在改变。具体表现在：中国获取亚太地区资源的潜力在改变；统合资源的方式、方法也在改变。因此，区分多层次的合作对象，做好安全风险管控，是新时期中国参与亚太合作的必然要求。“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③

二、亚太合作的历程与不足

亚太地区的合作是立体和多元的，具体表现在：亚太合作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方面；亚太合作的地理范围涵盖从整个地区到次区域的多个层次。第一，从整个亚太地区的层面看，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亚太合作的主框架。2020年，APEC领导人在制定2040年的新目标时，提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的愿景，预示着APEC将以经贸为纽带，弥合冲突与分歧，逐步黏合地区内成员，打造一个亚太命运共同体。第二，从次区域的层面看，主要有2009年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来演变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东盟主导的“东盟+X”自贸区、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ARF），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

首先，APEC是最早的和唯一的整体性亚太经济合作框架。APEC从宗旨上忠实地希望推进成员间的贸易自由化。APEC前期进展比较顺利，当时的主导力量是美国。中国在1991年加入APEC时还是小角色，经济体量不如日本和东盟。中国民众曾对

① 全球化的趋势在现实中不可能逆转，所以“逆全球化”是伪命题；就其本质而言，“逆全球化”一词的确切含义应该就是更为常见的“反全球化”。参见江时学《“逆全球化”概念辨析——兼论全球化的动力与阻力》，《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41470.htm?ivk_sa=1024320u。

APEC 寄予厚望。2014 年，北京召开 APEC 峰会。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加拿大、印度等大国首脑齐聚北京。人们对亚太的未来充满期待。当时 APEC 组织的目标，是各成员 1994 年在印尼茂物制定的“茂物目标”。根据这个目标，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要分别在 2010 年和 2020 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尽管 2020 年底，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布，基本实现了茂物目标。不过，2020 年初发布的《茂物目标最终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APEC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高关税壁垒在农产品贸易等领域依然存在；非关税壁垒更是无处不在，比如，在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限制贸易的措施不断出台。^①这是因为：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延缓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步伐，而且导致 APEC 的两大主要经济体，也就是美国与东盟，产生了龃龉，导致彼此的信任度下降。到了 2015 年，美国主导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协定，破坏了 APEC 的统合框架。

其实美国在 APEC 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了，为什么当时还要“另起炉灶”，设立 TPP 呢？一方面，美国不再热衷于看到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的亚太主导权受到了挑战。正如奥巴马在评论 TPP 时说的“不能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因此，TPP 的机制是排除中国的，目的就是边缘化有中国存在的 APEC，从而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其实美国并没有想清楚，究竟要推动亚太往什么方向发展，所以在 TPP 协议签好后一年，就又宣布退出了。那之后，TPP 由日本接手，完成了一个美国缺席的协定 CPTPP，并在协议中为美国的回归留出了空间。但是，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不会加入 CPTPP，一是因为美国一直奉行“离岸平衡”策略；二是想把亚太地区纳入其“印太经济框架”，以便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其实日本想把 CPTPP 打造成一个新的跨区域自贸区，而且不限于亚洲，所以一直在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2020 年，退出欧盟的英国申请加入 CPTPP。2021 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即便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针对中国的。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一个团结起来的亚太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太共同体的利益。中国参与亚太合作的一贯立场是：合作大于“对立竞争”、相对收益大于绝对收益，因此希望尽可能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总之，这些年里，亚太合作遇到重重困难，合作的力量与竞争对立的力量同时存在。虽然有各种规模和性质的合作机制，却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亚洲秩序。

东盟作为亚太合作的核心参与者，也开始在想别的应对办法。首先，东盟是区域合作的先行者，早在半个世纪前，就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为亚太建立秩序。1967 年东盟成立时，计划先在内部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市场，再吸引外资来一起建

^① APEC 政策支持小组：《APEC 茂物目标最终评估报告》，《太平洋经济合作研究》（2020 年合刊）。

设东盟经济共同体。进入 21 世纪，东盟把内部的合作关系和规则，逐步推向周边的大国。这才有了以东盟为核心的“东盟+X”自贸区、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机制。这个“X”现已囊括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所以最多能看到东盟“10+6”。

不过，“东盟+X”毕竟是较小范围的次区域合作机制。眼看 APEC 和 TPP 难以取得进展，东盟着手操办起了更大范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协定。RCEP 是从 2012 年开始谈判的，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全部 15 个国家的基本文本。它的本质是自由贸易协定，目标是在生效后的 20 年内，把内部关税降到零。毫不夸张地说，RCEP 要在 20 年后建成一个在贸易上类似欧盟的组织，而且它的 GDP 总量和人口总量比欧盟大得多。“RCEP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成员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30% 左右，覆盖世界 30% 的人口”。^①截至 2022 年 2 月 1 日，已有 11 个缔约国批准了 RCEP 协定并生效。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柬埔寨、中国、日本、老挝、新西兰、新加坡、泰国、越南和韩国。

总之，由于美国对亚太主导权的争夺，近年来的亚太合作存在下列不足。第一，APEC 框架下的经济合作缺乏实质性进展。虽然《2040 年 APEC 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要建设亚太共同体，但尚未讨论如何将其落实、如何制定阶段性目标等。第二，路径重叠。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和由东盟主导的 RCEP 两大机制重叠，会造成资源浪费。第三，“少数抱团”不利于解决问题。无论经济、政治，还是安全领域，少数国家抱团的现象依然存在。这阻碍了资源的统合优化。第四，东盟地区论坛被架空。以讨论政治和安全议题为主的东盟地区论坛，近年来被美日印澳、美日印、印澳法等小圈子边缘化。这些“小多边”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成员间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想法，^②与强调“通过磋商、对话等非正式和具体的方式进行合作”的“东盟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学界一般认为，东盟在过去的亚太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对这部分观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在过去的亚太合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支持东盟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从奥巴马政府开始，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美国不再一如既往地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活跃表现。即便如此，美国也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东盟。比如，特朗普政府曾推出以“蓝点网络”计划为代表的经济合作倡议，鼓励美国公司投资东南亚，并为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制定较高的认定标准。其实出台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但是，由于蓝点计划的实施难度很大，加之近年来美国对东南亚的投资持续减少，东盟国家倾向于观望。

^① 《10 缔约国批准 RCEP 即日生效，企业可享约 92% 关税减免》<http://sg.mofcom.gov.cn/article/ydy/zhd/202201/20220103233939.shtml>。

^② 陈庆鸿：《当前亚太小多边合作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3 期。

三、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意义

中国与东盟合作，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回顾亚太合作的历程，不难发现亚太地区并不只是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东盟正在成为众多地区合作机制得以建立的底座，是不可小觑的力量。2020年和2021年，东盟和中国连续两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一）理论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首先，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强制度下的同质性合作”，即合作各方必须达到同样的标准，遵循同样的制度，否则就参与不到合作之中。^①比如，早期全球化由发达国家主导，大部分合作要求相近的价值观，并遵守统一的制度，否则就达不到合作的门槛。^②欧盟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的典型，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标准化的入盟条件。这些条件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成员必须严格依照规则和制度行事。这与重视协商沟通的“东盟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与倡导平等开放合作的“一带一路”也不相同。

东盟国家强调协商的过程，会充分照顾各方的舒适度。事实证明，东盟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达成了共识，确立了规则。由于规则一旦被确立，就要严格遵守，因此“东盟方式”的本质是一种“从异质过渡到同质”的合作，在理论上比较符合英国学派的观点。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布赞认为，同质文化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形成，但异质文化也可以形成国际社会，只不过更加复杂。^③比如，异质文化可以借助两条途径来形成国际秩序。一条是，相异单元通过持续互动变得越来越相似，即“彼此同化”。另一条是，相异单元接受那些权责明晰的规则、规范和制度。不过，相比于东盟方式的“从异质到同质”的合作，“一带一路”走得更远。

“一带一路”欢迎异质行为体间的合作，主张平等、开放、共赢，不追求“趋同”。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不以结果为导向，这无疑是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平台，“一带一路”具有类似社交网络的强包容性。首先，它不仅横贯亚欧，还延伸到了非洲、拉丁美洲。其次，它的合作内容不仅关乎陆地、海洋的常规联通，还有“数字丝绸之路”和“冰上丝绸之路”。再次，它不设刚性的制度。合作的标准、方式、内容、进度都可由合作方协商决定，灵活多样。最后，它向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的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开放，包括向美国、印度发出邀请。

^① 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s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3, June 1993, pp.327-352.

（二）战略意义

东盟在亚太合作中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虽然东盟国家大多是岛屿国家，但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可谓是被大国包围的区域组织：往北是中国和日本，往西是印度；往南紧邻着澳大利亚，往东与美国本土隔太平洋相望，距离美国建有军事基地的关岛和夏威夷则更近一些。于是，东盟国家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这种大国环绕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稳固自身的地位。近年来，在东盟文件和域外大国的表态中，常见到一个说法叫“东盟中心地位”。它蕴含着三重战略意涵：东盟的中立地位、战略中间人地位以及地区领导者地位。

第一，寻求“中立”地位，尽量避免卷入地区大国的争斗。东南亚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之害。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中国与东南亚合作产生的重要外交成果。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也旗帜鲜明地采取中立的外交策略。所以，东盟国家不愿意看到中美对抗。正如东南亚流传的一句谚语所言：大象打架，老鼠和鹿遭殃。2018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东亚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警告，东盟可能会在某一天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希望这一天不会很快到来。

第二，扮演“战略中间人”，通过与周边大国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等方式，在大国之间、大洲之间撮合起了各种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通过扮演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中间人角色，东盟为自身赢得了话语权。说实话，东盟获得这一立场，并且让中国认识到这个立场，还是相对晚近的事。十年前，由于南海争端，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关系闹得很僵，这也给了美国和日本拉拢东盟、插手南海争端的口实。大概在2013年前后，中国逐渐认识到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有能力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大国，包括让东盟集体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作用。

第三，争当“地区领导者”。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大多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但在冷战年代，还是难免沦为美苏争霸的棋子。越南战争就是东南亚成为冷战前线的一个例子。冷战结束后，东盟开始主动出击，要求由东盟国家内部先来讨论自己的安全问题，制定相关的安全条例。比如，缅甸局势不稳，国际上也是由东盟出面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尽管东盟似乎难以摆脱“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悖论，但显然在谨慎地寻求与中美的“等距离外交”。比如，2018年10月，东盟与中国举行了海上联合演习。那是东盟首次与单一国家举办联合军演。2019年9月，东盟与美国也举行了海上联演，前后相隔不到一年。

东盟的中立、中间人和地区领导者角色，让各大国发现，把亚太事务交给东盟来主导，比交给任何一个大国来主导，更令人信赖。这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奠定了难得的共识基础。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东盟通过内部协调来平衡中美在亚太的角

逐。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相对好一些，东盟就着意靠近美国，疏远中国；当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时，东盟则运用对议程的设置权力来规避敏感议题，避免矛盾激化。对于特朗普政府 2020 年发布的涉南海声明，东盟反应冷淡。这些都说明，在中美竞争激烈的领域，东盟不会选边站。

（三）现实意义

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红利、数字经济等方面，东盟不乏亮点。东南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南亚既处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又处在亚欧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是两大洋和两大洲间的“十字路口”，东西方之间海上航行的必经之路。如果把东盟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中国的海洋邻国，也就简化成了日本、东盟和韩国三个。因此，中国如果能处理好与东盟的关系，就解决了海洋安全与海洋贸易中的大部分问题。

东盟在人口、GDP 规模、矿产等方面有着丰富的优势。截至 2021 年，东盟十国的总人口接近 7 亿，超过拥有 4.5 亿人口的欧盟。印尼作为东盟的核心国家之一，其人口位列世界第四。论 GDP 规模，东盟同样不可低估。东盟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排在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之后。其中，新加坡、文莱的人均 GDP 高出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人均 GDP 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水平。此外，东盟国家生产的橡胶、锡、麻、椰子，占全球一半以上，棕榈油占全球的 30%。泰国和越南的大米出口，位列世界第二、第三。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通过开采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为油气出口国。东南亚还拥有翡翠、宝石、名贵木材、药材等稀缺资源。

东盟是数字经济的新兴重要市场。东南亚是世界上潜力最大、增长最快的数字市场之一。因为东盟各国刚好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赶上数字经济崛起的时机，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自然而然地成为投资商追捧的对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东盟国家的线上经济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2020 年的疫情使东南亚地区仅一年就新增了 4000 万互联网用户。截至 2020 年，东盟共有 4 亿网民。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东南亚当地人的消费习惯；网购、电子支付和打车服务都在迅猛增长。

除了市场潜力大的优势，东盟国家依靠丰富的人力资源，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实际上，东盟国家很大部分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都是从中国东南沿海转移过去的。相比中国，东南亚不仅有着更低廉的劳动力，而且拥有便利的海运。这决定了东南亚做的是出口导向型贸易。近年来，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转变。这种优势互补，让中国和东盟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到了贸易的好处，不仅能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还能促进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和升级。

中国与东盟既是陆地邻国（便于开展边境贸易），又有领海相接（便于发展海上贸易），因此有利于开展多层次的地缘经济合作。比如，中国南方的沿海省份经

济发展水平不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较为发达，广西、海南相对后发），与东盟一衣带水。这种不同梯度的发展水平，既适合双方进行产业内贸易，也可发展产业间贸易，从而形成立体的经贸合作网。此外，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领域，基本涵盖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所有行业。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三来一补”及加工贸易，近年来开始向第一产业和服务业倾斜。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中，新加坡约占一半。在东盟各国中，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是最多的。

四、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一）开放、流动的亚太共同体

作为一种理念，亚太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契合之处。像《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展望2040年，将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①与此同时，APEC强调将通过“贸易和投资”“创新和数字化”“强劲的、平衡的、安全的、可持续的和包容的增长”三条路径来实现这个愿景。^②可见，亚太共同体与亚太命运共同体是可以相互交融的。由于亚太国家在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文明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需要被亚太共同体接纳，因此，包容和可持续发展观沉淀为APEC成员的共识。从这一角度看，亚太共同体的倡议有望使APEC重新焕发生机。

东盟一直秉持着“区域开放主义”，亚太共同体也力主开放，因为开放可以把“蛋糕”做大，有利于保持系统的活力。根据熵增定律，宇宙万物从诞生起就不可避免地衰变，直至灭亡，熵表示体系无序性不可逆地持续增加。熵增理论认为，在一个封闭的孤立系统内，热量总是从高温流向低温，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这种趋势不可逆转。不过，“人类可以通过与外界持续交换物质和能量，远离静止的平衡态，从而保持生命的活力”。^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近年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越南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美国与中国“脱钩”成为可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越南不太可能替代中国大陆的产业优势。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门类很齐全的国家之一，而越南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具体表现在它的进口和出口规模都很大，因此贸易顺差并不大，赚取的利润主要来自转口贸易和贴牌贸易。与中国相比，越南的工资涨幅也要低得多，所以每到用工旺季，也就是出货的高峰期，胡志明市等地经常发生罢工。由于工人手中有要挟企业家的筹码，涨工资的诉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即便如此，越南工人的加薪速度依

① “APEC Putrajaya Vision 2040”,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20/2020_aelm/Annex-A.

② 杨泽瑞：《论APEC亚太共同体建设及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

③ 高奇琦、隋晓周：《元宇宙的政治社会风险及其防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因为薪水一旦涨得过高过快，就会增加企业成本，导致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此外，越南的电力供应不足，严重依赖中国。很多企业被迫自建发电厂来解决供电问题。

第二，美国很难与中国彻底“脱钩”。首先，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度比较高，所以中国也具有反制的能力。如果美国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全方位地制裁中国，美国民众的生活和消费会立马陷入混乱。这会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次，全球发展失衡是当前最为严重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在发达国家具体表现为经济复苏乏力。由于美国的低收入群体长期领低保，而且大部分美国人不习惯储蓄，加上疫情期间能领到额外的补贴，因此他们缺乏工作的动力和干劲。这是美国经济难以恢复的一个原因。不过，一个开放的亚太共同体，能增加人的流动，有助于改善这个问题。这样说的理论依据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

根据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主人和奴隶的关系需要借助“物”才能成立。因为奴隶生产物件供主人使用，是主奴关系建立和得以维系的标志之一。一旦奴隶停止生产物件，主人的生活也将失去依托。由于“物”的存在，主人相当于成为了自己奴隶的“奴隶”。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个论断。从理论到现实，如果美国对中国、东盟国家等保持开放，允许互相投资设厂，将自然而然地增加人的流动。一方面，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鲜“血液”流入美国，将刺激美国本土民众的危机意识，调动起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或将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入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带动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升级。长期这样做的结果是，发展要素在不同的亚太国家之间均衡分布。这不就是亚太共同体描绘的“共同繁荣”吗？

（二）RCEP 的利益与风险

由东盟主导的 RCEP，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被寄予厚望。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RCEP 在中国正式生效。这不仅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更加便利，而且有利于扩大出口。当然，RCEP 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从伙伴国的进口。这能提高中国消费者的福利，当然也会增加中国对这片区域的贸易逆差。值得注意的是，RCEP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有用武之地。因为东南亚是除中国外，使用人民币最普遍的区域。随着 RCEP 机制的完善，将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选择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东南亚跨境交易结算的一个主要货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中资银行已经在东盟全境实现了覆盖。这预示着人民币作为投资和储备货币的热度，也会逐渐升温。

根据世界银行的《2020 年营商环境指标》，RCEP 国家的金融营商环境有待改善，因为只有少数缔约国在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人、破产保护这几项，达到了世界

领先水平。^①对中国来说,RCEP的金融服务附件代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最高承诺水平。这些规则有望吸引外来金融机构的投资,帮助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当然也可能会增加中国大陆的金融风险。此外,由于RCEP各国的比较优势多元化,从长期来看,会形成区域价值链。现阶段中国的高端产业和基础产业,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激烈的竞争。比如,高端制造要和日本、韩国比拼;资源能源类企业将直面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和越南、菲律宾抢订单。不过,这可能会倒逼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

印度没有成为首轮RCEP的缔约国,对RCEP和中国来说,都是遗憾。其实从长远看,加入RCEP,对印度是有利的。因为印度的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加入RCEP,服装等轻工业的出口关税将取消;轻工业的发展能带动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循着这条道路推进的。但是,印度从积极参与谈判,到犹豫不决,直至最终退出,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印度的服务贸易相对更发达,而RCEP更侧重货物贸易。中国在货物出口方面有着极大的竞争优势。莫迪政府担心,加入RCEP会导致短期内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谈判初期,莫迪政府因不满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强势,想通过加入RCEP来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但是,到了谈判后期,莫迪政府的国内支持率下降,迫使他重新掂量长短期利益的孰轻孰重,同时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转移国内矛盾。

由于RCEP和CPTPP存在一定的路径重叠,前者将面临来自后者的竞争。首先,CPTPP对成员的约束度更高。它规定成员之间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而RCEP只规定了90%。^②其次,CPTPP还努力打破成员之间的数据和服务壁垒。此举能为零售业、银行业和电子商务带去更多的利好。因此,未来RCEP如果能在上述方面制定更高阶的规则,并吸引印度加入,可能会在与CPTPP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根据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布的《2022年10+3区域经济发展展望》,10+3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7%,2023年将增长4.6%。^③报告认为,10+3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比较高,所以,未来受新冠疫情冲击的风险相对较小,可以期待更有力的经济复苏。不过,俄乌冲突是新的外源性风险。随着战火飙升的能源价格,已经在损害10+3经济体的出口和增长了。此外,美国因通胀加剧而收紧银根,也会波及RCEP地区的金融市场。

(三)“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给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如今,来自中国的经贸合作,已经深入到东

^① 世界银行官网,2020年营商环境数据来源:<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doing-business-score>。

^② RCEP官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文本来源:<https://cn.rcepnews.com/>。

^③ AMRO官网,《2022年10+3区域经济发展展望》报告来源:<https://www.amro-asia.org/areo2022/>。

南亚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依然突飞猛进。“一带一路”之所以在东南亚受到欢迎，是因为东盟国家，尤其是大陆东盟国家的公路、铁路、港口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比较缺乏。这对它们的工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形成了掣肘，而“一带一路”在这些方面可以有大的作为。比如，位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柬埔寨、老挝、缅甸三个国家，由于经济水平难以支撑泛亚铁路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导致铁路建设在三国境内严重滞后。“一带一路”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已经初步显现出国际物流黄金通道的作用。对中国来说，中老铁路大大提升了面向东南亚的开放水平。对老挝来说，这条铁路寄托着国内经济从疫情中复苏的希望。老挝《万象时报》称，老政府将扩大经由铁路的对华出口，力争2022年的贸易顺差比上年增加55%。^①2022年1月，老挝通过向中国出口天然橡胶、肥料和鲜花等，实现了4100万美元的对华贸易顺差（上年同期为逆差1000万美元）。^②此外，中老铁路不仅发往老挝，而且可以辐射到周边国家。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甚至缅甸，都在通过中老铁路运输货物。货物品类已经从开通初期的橡胶、化肥、百货，后来扩展到了电子、光伏、通信、汽车等100多种。

2022年4月28日，中老铁路的首趟冷链水果专列进入中国磨憨口岸。这趟专列载有来自泰国东部尖竹汶府的27只集装箱、共计500吨榴莲，运输时间为4—5天，比陆运和海运都要快捷。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从万象到昆明的货运成本将降低40%—50%；老挝国内线路成本将降低20%—40%。^③此外，在中国的基建能力和资金支持下，途经万象、金边、西哈努克港的老柬铁路，很可能成为下一条正式开工的泛亚铁路项目。因为老挝和柬埔寨都有改善国内交通条件的强烈愿望，所以在政治上有足够的推动力，而且这两国也比较接受中国的技术和施工标准。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项目启动后也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成果。澜湄合作因水而生，水资源合作是澜湄合作的一个优先领域。澜湄六国成立了水资源合作中心，并定期举办论坛。离不开水的纺织服装行业也是澜湄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一条河的上下游国家往往会因为争夺水源而纷争不断，但中国与下游的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却通过合作而实现了水资源的互利共享。中国还主动为澜湄合作提供各种形式的融资。2016年，澜湄合作专项基金设立，目前已支持开展了400多个项目，为4万多人提供了培训。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正在编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情感纽带。“亲如一家”不

① 徐晓阳：《中老铁路运营百日：开局良好 未来可期》，《光明日报》，2022年3月13日。

② 徐晓阳：《中老铁路运营百日：开局良好 未来可期》，《光明日报》，2022年3月13日。

③ 世界银行官网，《从内陆到陆联：释放中老铁路联通潜力》报告来源：<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891>。

仅是澜湄文化的长期目标，也是几乎所有人文交流的终极目标。因为情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突破文化隔阂，形成集体认同，为“一带一路”打开有温度的合作空间。艺术方面，有澜湄国际电影周、艺术节；青年交流方面，有“澜湄之约”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青年创业大赛训练营；妇女发展方面，有澜湄妇女论坛、妇女实用技术培训班；旅游方面，有澜湄旅游城市（三亚）合作论坛、旅游城市合作联盟；教育方面，有澜湄国际职业学院、中国政府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和来华培训机会；公共卫生方面，有跨境联控传染病行动，以及为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手术的“光明行”；宗教文化方面，有澜湄佛教领袖对话、佛牙舍利赴缅甸泰国供奉等活动。

放眼未来，中国与东盟在科技领域也会有合作机会。东盟是数字经济的新兴市场。包括阿里云、微软、谷歌等在内的云计算厂商，都纷纷在东南亚加大投资，招聘人才并建设更多数据中心。在电商领域，东南亚最大的两家购物网站，一个叫作Shopee，中文翻译为“虾皮”，它最大的股东是腾讯；另一个叫Lazada，中文叫“来赞达”，由阿里巴巴绝对控股。这两个东南亚电商巨头，在产业链条、金融链条上，都和中国市场形成了对接。这些基层商业的联通，与RCEP的顶层设计齐头并进，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亚太合作的进程。

五、结语

亚太地区对中国至关重要。区分多层次的合作对象，做好安全风险管控，是新时期中国参与亚太合作的必然要求。

因此，新形势下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一带一路”突破了传统的合作模式，欢迎异质性合作，主张平等、开放、共赢，而且不以结果为导向，无疑是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其次，东盟“中心地位”具有三重战略意涵。东盟的中立、中间人和地区领导者角色，使它成长为一股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再次，东盟作为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红利、数字经济等方面不乏亮点。

展望新时期亚太合作之路，中国将面临下列机遇与挑战。第一，一个开放的亚太共同体，有利于把“蛋糕”做大，保持系统的活力。第二，RCEP可能在贸易逆差、人民币国际化、金融营商环境、全产业链竞争等方面，为中国带来利益与风险。RCEP未来如果能吸引印度加入，并制定更高阶的规则，会在与CPTPP的角逐中脱颖而出。第三，“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具有广阔的前景。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已经初步显现出国际物流黄金通道的作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正在编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情感纽带。

[责任编辑：王国平]